

晶晶的东西是石英砂和苏打混合烧成的。这就是玻璃。他当时还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铁棒连接一个泥制的罐子模型，把烧熔的玻璃往模型里面灌。古埃及人还在配料时加进各种氧化金属，由此就可以做成各种彩色玻璃，吹制玻璃球、酒具、花瓶等。

传说终归是传说，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五千年，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

在中国古代，玻璃又被称为“谬琳”、“陆离”、“琉璃”等。大约在明代以后，文献记载中才出现“玻璃”一词，且沿用至今。有人推测中国玻璃的发明，与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冶炼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 1080°C 左右。而玻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玻璃的主要原料，其他原料还有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 1200°C 。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初步加工，便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和探索，古代中国人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中原最早的古玻璃当以草木灰中的氧化钾为助熔剂，从原始瓷釉演变而来；或认为玻璃的发明可能是与古代炼丹术士的实践有密切关系。

中国最迟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了玻璃制造术。据考古学资料，在我国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一些墓中已发现有玻璃制品。

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云南李家山 22 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山西长治分水岭 270 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等等。

当发明玻璃后，中国的统治阶层都被这种晶亮如水的神奇东西所吸引了，许多贵族都以拥有玻璃制品为荣。西汉人桓宽在《盐铁论·力耕第二》说：“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在中国，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人，好东西当然能大量拥有。据说汉武帝的甘泉宫西面的招仙阁和昭阳殿都是以青或绿色的玻璃作窗户。汉朝初年，还有人制成七株琉璃树献给上林苑。上行下效，当时的达官贵人也从各种途径得到各种玻璃制品，此风气甚至延续到魏晋以后。魏晋时期的王济是一个非常有钱也特别奢侈的士大夫，他收藏、拥有很多玻璃器皿，并以之作为日常饮食之器具。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曾临幸王济家，结果这位臣子家中生活作风之奢靡，让晋武帝有点受刺激，一顿饭没吃完就走人了。刺激的原因是“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这被收录在《世说新语》的“奢汰篇”里，作为挥霍无度的一例突出表现。此事也见于《晋书·王济传》，说是他“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

对玻璃器的追捧和需求，刺激了中国古玻璃制造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对外贸易中外国玻璃的输入。当时输入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张骞开通西域的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中国官方商船自合浦、徐闻港航行到达东南亚或以远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有这样的记述：“有译长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可见

玻璃是当时从海外输入货物的大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专家们通过对世界和中国出土的古代玻璃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确知世上的古玻璃可分三大类。第一类含有较多钠、钙成分的古玻璃称钠钙玻璃，是古罗马、埃及等西方国家所生产。第二类含铅、钡成分较多的则称铅钡玻璃，是中国中原地区自己生产的古玻璃。第三类玻璃含钾成分极高，产地主要是在东南亚。

虽然中国的铅钡玻璃很早就为古人所发明制造，但其发展缓慢，并一直保持着固有的特点，既具有绚丽多彩、晶莹剔透的优点，又有轻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的缺点。这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铅钡，烧成温度较低所致。铅钡玻璃不适合制作饮食器皿，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等。相比之下，西方古玻璃一直以钠钙玻璃为主，耐热性能较好，对骤冷骤热的适应性较强，因此西方古玻璃的用途和生产量都远大于中国。从遥远的西方把玻璃运抵中国，其价钱自然十分昂贵，因此拥有西方玻璃制品的多是统治阶层或富豪。中国两汉时期墓葬出土的一些钠钙玻璃制品证明了西方古玻璃输入中国各地的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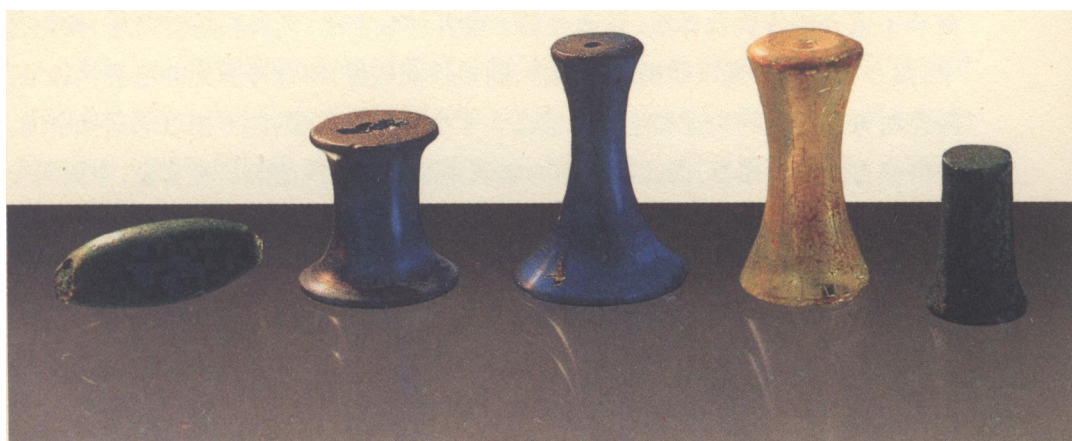
云南李家山古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他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

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一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

广州横枝岗 2061 号汉墓出土了三只玻璃碗。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 10.6 厘米，底径 4 厘米，模制成型。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

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出土了玻璃残片。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型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我国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融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分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合浦、昭平等地出土的玻璃器。从左往右第1件为橄榄形珠，第2~4件为耳铛，第5件为鼻塞。耳铛是一种挂在耳旁的垂珠，而鼻塞则是汉代常见的一种殓具。汉代人相信“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因此常用九窍塞来填塞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阴部等九个窍孔，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逸出，以达尸骨不腐。九窍塞常用玉所制，也有用玻璃制成的。

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他一些珍贵文物一起被送到日本展出。



■合浦堂排三号墓出土的深蓝色玻璃珠，珠直径长0.5厘米，略近圆形。玻璃多从海外输入，因此十分珍贵。这也说明墓主人生前十分富有。

广西合浦、贵港、昭平、梧州、柳州、柳江、兴安、贺州、钦州等地汉墓都发现有较多的玻璃制品，种类有玻璃珠、管、耳珰、鼻塞、璧、环、杯、碗等。

玻璃珠是玻璃制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出土玻璃珠的总数达5000多颗。合浦县堂排三号西汉墓共出土玻璃珠达1080多颗，足以说明墓主生前十分富有。玻璃珠色彩丰富，十分莹润，有蓝、青、淡青、绿、湖水蓝、白、月白、砖红、紫褐等颜色，形态有的像算盘的珠子，

有的像渔网的网坠，也有的如橄榄之果，还有椭圆形和菱形的。玻璃珠最大的近2厘米，小的约0.5厘米，中间均有一小孔，可穿细绳。从玻璃珠出土时多数位于人骨架的头部或胸至腰之间判断，应是死者身上所佩戴的饰物。

玻璃耳珥常见形态像腰鼓，中间束腰，两头呈喇叭形。《后汉书·舆服志》说：“簪、珥、耳珥垂珠也。”可见耳珥可作耳坠，亦可挂于脖子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至今仍有这样的配饰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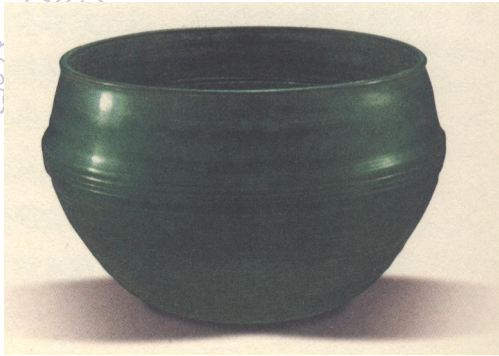
玻璃鼻塞是一种九窍塞，是中国古代民族葬礼中对尸体的一种处理方式所用的物品。它产生的时间较早，大约在商周时期已有玛瑙、骨、大理石、玉、金等不同的质地。用玻璃为材料的鼻塞最早见于陕西省咸阳市战国墓。广西发现了四件玻璃鼻塞，其中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为圆钉帽状，绿色，半透明，长约1.3厘米。



■合浦环城红头岭34号汉墓出土的深蓝色玻璃杯，通高6.8厘米，口径9.2厘米。圆底，深腹，腹饰三道突起的弦纹。此杯形态在两广汉墓出土物中较少见，可能是海外输入品。

璧是中国的一种礼器，也是一种配饰。璧多以玉石所制，汉墓中多有玉璧出土。用玻璃制造璧始于春秋战国。广西仅合浦望牛岭二号汉墓出土一件。平面呈圆形，中间有孔，正面饰以方格纹，内径13厘米，外径3.7

厘米，厚约0.4厘米。



■合浦文昌塔70号墓出土的淡绿色玻璃杯，通高5厘米。半透明。经化学成分分析，它属钾玻璃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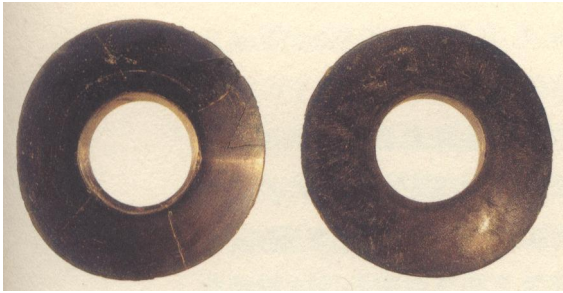


■这件深蓝色的龟形器是1985年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的，呈椭圆形，器身环间有六爪，爪呈三叉形，其中侧边四爪类龟的四肢，头尾两爪则象征龟头和尾部。此类器物的造型与越南沙黄遗址出土的器物有相似之处。经化验，此器属钾玻璃系统。

最具有工艺技术水平的是玻璃龟形器了，仅发现一件。1982年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这是一件青色龟状玻璃配饰，弧形略凸的龟背有孔眼，作穿绳之用。两侧各伸出两爪，爪尖开三叉，首尾露出作爬行状，生动且有趣，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广西汉墓出土的玻璃器皿仅有三个杯和三只碗，其中以杯最为精美。

1957年贵县东郊南头村三号东汉墓出土的是一套托盘高足杯，它由杯和托盘两部分组成，杯口敞开，深腹，外腹腰部饰两道弦纹，托盘内底有圆形凹槽，杯足可套入凹槽。杯高8.2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5.2厘米，盘高2厘米、底径9厘米、口径12.4厘米。通体呈透明淡青色，开细小冰裂纹，是吹制而成。三件圈底杯皆为贵县汉墓出土，均广口，直腹，腹中部有凸起弦纹，颜色呈淡绿或蓝色。其中一件高4厘米、口径7.7厘米、厚1厘米。



■环是一种配饰，通常其孔径大于璧而小于瑗，常用玉石制成。但这是一对用玻璃所制的环，1987年合浦县饲料公司7号墓出土。



■1957年贵县东郊南头村东汉墓出土的玻璃托盏。它由托盘和杯两部分组成，杯为短把，托盘内底有一圆形凹槽，正好可套入杯足，既稳妥又美观。此托盏风格与两广汉墓出土物不同，可能亦是由海外输入。

关于广西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海外输入说，即认为它们多数或绝大多数是源于海外，少数源于中国内地；另一种是本地自创说，即认为它们多数是本地制造的，但不排除有从海外输入的可能。

海外输入说有较多文献资料支持，而本地自创说则忽视了文献记载的事实。《汉书》不仅有“入海市琉璃”的记载，而且也明确地记述了商船是从合浦港口出发，“璧琉璃”乃属输入货物之大宗。如果两广汉墓的玻璃制品多数是本地所创，那么有哪些玻璃制品是从海外输入的呢？且有必要舍近求远，耗费财力大量从海外输入吗？

现代的科学测试技术是确认玻璃产地的重要方法。经测试，西方古代玻璃是钠钙玻璃，中国古代玻璃是铅钡玻璃，而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制品有 17 件经过测定，其中 13 件是钾玻璃，3 件属铅钡玻璃，1 件是钾钙玻璃，而无钠钙玻璃。据此，自创说认为，广西汉墓所出的、占绝大多数的钾玻璃既不同于中国内地的铅钡玻璃，也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所以应是本地制造的。但是这种钾玻璃即使不同于中国制造的铅钡玻璃，也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但却不一定是本地制造的，道理极简单，因为当时东南亚国家也是钾玻璃的产地。

贵县汉墓出土的玻璃杯和玻璃托盏，其化学成分属钾玻璃系统，造型、风格却与岭南地区汉墓的铜、陶器迥异，而与韩国古墓出土的西亚风格的玻璃器皿相同。因此也证明了广西汉墓出土的钾玻璃多是从东南亚国家输入。

海外贸易不仅输入外国的玻璃制品，也逐渐传人了钾玻璃制造术。据

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说：“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人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可见迟至晋时，交广（今广西、广东、越南一带）人已经掌握了相应的玻璃制造术。

奇香神药

人类对香料和药物的最初认识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在原始人类生活里，他们在无数次地接触大自然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实践过程中，认识了其中的一些物质具有芬芳的气味、舒适的口感及其可以治疗疾病的效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中国关于神农氏遍尝百草，寻找可治疗疾病的草药的传说，生动地说明中国古人类很早就认识和使用香料和药物的历史事实。

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古埃及人制作油膏涂抹身体，而且据说在公共场所不涂香水是违法的。相传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经常使用十五种不同气味的香水和香油洗澡。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古埃及人用没药、洋香杉等精油浸泡绷带以杀菌防腐。古希腊人在大型宴会上，事先将鸽子和其他鸟儿浸泡在香水里，然后让它们在客人中飞翔，散发浓郁的芳香。古罗马人的公共浴池也大量使用香料。

阿拉伯人是最早制造香水和使用香料的艺术大师，他们将香料掺在泥灰中建筑清真寺或宫殿，以使建筑物永久地散发香味。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发明了从芳香的花卉中提取香水的蒸馏法。当时波斯境内种植大面积的玫瑰，巴格达在《天方夜谭》中被形容为“香料之城”。而欧洲人发明香水，还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受到启发的。

在中国较古老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各种香草的记载，如薰、蕕、兰、鬯、蕙等。薰即薰草，因采取燃烧方式而获得香的烟和气味，故称薰。《左传·僖公四年》说：“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薰和蕕都是一种香草，臭即香的意思，能十年尚闻余香，可见确是香气袭人了。中国古代医学家李时珍曾说：“古者烧香草以降神，故曰薰、曰蕕；蕕者薰也，蕕者和也。汉书云蕕以香自烧，是矣。”薰草是属禾本科，生长在略潮湿之处，在古籍中薰草或称蕕草，也有称燕草。嵇含《南方草木状》载：“蕕草一名薰草，叶如麻，两两相对，气如靡芜，可以止疔，出南海。”

兰亦是一种香草。可煮水而成香气扑鼻的兰汤用于沐浴，或做成香包随身悬挂，亦可煎膏成有香气之烛。古代文献对兰草的记载很早，《易·系辞》有“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说法。《诗经·郑风》也有描写当时青年男女郊游时，约会于今河南溱洧两水之时，手上也常拿着一枝芳香的兰草。

鬯即郁，它是一种可用于酿酒的香草。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说：“郁，香草也。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诗经·大雅·江汉》也说“秬鬯一旨”。“秬鬯”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是当时祭祀宗庙及先祖常用之物品。

对香料的喜好和广泛应用，促进了海外香料的商贸活动。两汉时期海外输入香料的主要通道除经西域的陆路外便是从东南亚经番禺和合浦港输入。据中国古文献记载，自汉唐以来从海外输入中国的高级香料主要有以下数种：

龙脑香(梵名 Karpura)，是从龙脑树的树干中蒸馏出来的白色结晶粒。

龙脑树（学名为 *Dryobalanops aromatica*），在古代主要生长在婆罗洲北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树高 50~60 米，树干直径 3 米，树形呈圆锥状，椭圆状叶、白色花，其叶、花及果都有香气。龙脑香除了取自树心的天然结晶颗粒之外，也常砍倒龙脑树，收取树心涌出的胶脂，剩余的木材则加工蒸馏出白色结晶。由于所取的部位及方法不同，所以有龙脑香、龙脑油及冰片之不同名称。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龙脑香在西汉已出现在广州。南朝梁的文献记载中曾说：“生西海律国，是彼律树中脂也，如白胶状。”唐末《酉阳杂俎》卷十八说，龙脑香又名“固布婆律”，“其树有肥有瘠，瘠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波斯断其树，剪取之，其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有别法”。文中说，固布婆律树，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肥沃的产出婆律膏，贫瘠的产出的则称为龙脑香。在波斯常以剪断树枝的方法来获取树端的婆律膏。《酉阳杂俎》曾记载龙脑香入贡的情形：“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

乳香，即薰陆香树（梵名 *Kundurū*），其形状和香气颇类似松脂，颜色略带黄色。乳香主要产自大食、波斯、印度等地。乳香树的树叶为羽状复叶，花落，结小核果，呈三角形。乳香是一种胶状树脂，从乳香树中流出，因为其脂汁滴如乳头，所以也称为乳头香、乳香。乳香整株植物都具芳香性，所供给的乳香可以制成神香，用于庙宇中焚烧。乳香价格较昂贵，在古代与黄金及没药具同等价值。乳香输入中国主要是从海路，唐宋以来从海外输入的香料中它属大宗的。据《粤海关志·卷三》记载，仅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南方三大港口市舶司抽买的乳香就达 17.5 万斤，其中广

州一地即占 90%以上。

安息香 (Styrax benzoin)，是中国传统的进口香料。安息是波斯王朝的名称 Arsak 的汉代音译，因为其当初是由安息国的商人传到中国，所以称为安息香。安息香是指从安息香树伤口处流出的树汁凝固而成脂。安息香树产地大多分布在苏门答腊、爪哇，也产在暹罗、印度、波斯。唐代段成式具体描写过其形态：“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岁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蕊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从植物形态学而言，安息香树为落叶乔木，叶互生，卵形或椭圆形，叶面无毛，叶背有白色星状毛，叶脉铁锈色。夏季开花，花带赤色，有香气，聚伞花序，顶生或叶生。安息香状如松脂，黄黑色，呈半透明状。此香亦为中医常用药，用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厥、产后血晕等症。

苏合香，是希腊语 Sturaz 的音译，苏合香油是从高亚打枫树枝干上流出的树胶中提取的。《梁书·中天竺传》说“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所以国内多“大秦珍物”，其中包括苏合。作者还解释说：“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唐代苏合香从海陆两道输入中国，所以《唐本草》说它“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极芳香。重如石，以烧灰白者为上品。苏合香主要用做外用药，“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受此风影响，“患大风者亦仿之”。苏合香，又称兜娄婆、都噜婆、妒路婆、突婆、率堵鲁迦，意译为白茅香、茅香、香草。根据《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七记载，可以在坛前安一小火炉，以兜娄婆香煎取香水以沐浴。苏合同时也是舞乐之名，略称苏合。乃新乐、盘涉调，属大曲。舞者以苏合

药草为甲冑而作舞，故有此名。有说是陈后主所作，也有说为中印度之乐曲。根据《舞曲口传》记载，阿育王患病，求苏合之药草，经过七日而得，病即得痊愈，他的大臣就以药草为甲冑而作舞，因此而有“苏合”之舞。

龙涎香(Ambergris)，是抹香鲸(学名为 *Physeter carodon*)的分泌物，遇热就会散发出异香，是调制合香中极佳的珍贵香料。龙涎香的最主要用途在于调制合香，添加了龙涎香可以使香烟凝聚而不易飘散。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涎方药鲜用，惟入诸香，云能收脑麝，数十年不散。又说焚之则翠烟浮空，出西南海洋中，说是春天群龙所吐涎沫浮出，番人采得贩售，每两千钱。其中还记载了龙涎香的形状，说也有从大鱼腹中剖得此香，其形状初若脂胶，黄白色，干则成块，黄黑色，如百药煎而膩理，久了则呈紫黑色，如五灵脂而光泽，其形体轻飘似浮石而腥臊。焚烧龙涎香用量极少，只要如一豆大的用量，就会有异香。其最大的特色是能聚烟。将它与其他的香品混合，燃烧时有助于“翠烟浮空，结而不散”。而在《岭外代答》卷七中记载：“龙涎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一铢，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此其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在这段记载中说明了龙涎香的最主要用途在于调制合香，还指出龙涎香可以使香烟凝聚而且不易飘散。龙涎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初唐时期，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由阿拉伯进贡至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描述悟真寺的景色中有“泓澄最深处，浮出蛟龙涎”一句，其中“蛟龙涎”就是龙涎香。龙涎香在宋代常被用来做珍贵的贡品。在宋末元初陈敬的《香谱》中引叶庭珪《香录》(1151年序)说：龙涎出大食国，其龙多蟄伏于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涎浮水面，士

人见林鸟翔集，众鱼游泳，争嗜之，则没取焉，然龙涎本无香，其气近于臊，白如百药煎而膩理，黑者亚之，如灵脂而光泽，能发众香，故多用之以和众香。

香料非金属和陶瓷等物，汉代的香料有实物能保存至今则是十分罕见的。在南越王墓西耳室的一个口径为 9.5 厘米的精致漆盒里装有重 26 克的树脂状物，专家把出土的样品和现代乳香、松香在同一条件下作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其与松香截然不同，而与现代乳香极相似，差异很小，由于它埋藏地下两千多年，所含的主要成分已分解，但不排除它确是乳香。同时实物的外形与泉州后诸宋船内发现的乳香类似。

汉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有燃熏香料之俗，燃香之风以当时岭南人为最盛，此与名贵的外国香料大量从海外输入有密切关系。燃香要使用专门的炉具——熏炉，岭南汉墓中以熏炉为随葬品的现象很普遍。如广州发掘的 400 余座汉墓中，共出土熏炉 112 件，而洛阳烧沟发掘的 220 座汉墓中，仅出土熏炉 3 件，两地差异极大。熏炉主要有陶质和铜质，制作较为精美。炉体为一高足的浅盒（豆形）。有盖，盖上镂空，供燃香时香气溢出。由于时代及燃烧香料的种类变化，熏炉的形状也略有变化。专家认为早期豆形熏炉炉身较浅，炉盖较平，熏烧的是一种草本香料，有利于香草充分燃烧。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熏炉里装满茅香，汉代有吟咏熏炉的诗曰“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可知茅香即“蕙草”了。当然，在使用外来香的初期，将龙脑末之类撒在茅香上熏烟也有可能。而熏烧树脂类的香料的熏炉，盖变高而炉身变深，以便在炉内下部盛以炭火，炭火上放置树脂类香料，使其徐徐发烟。广州汉墓出土的熏炉内曾发现有未烧完的炭粒。

除香料外，也有从海外输入的药物。广西汉墓中曾出土过铁冬青、金银花、柏叶等草药。

秦汉时岭南人已会使用各种药物来治疗疾病，在两广汉墓中都曾经发现过一些药物，它们多数是本地所产，也发现有从海外输入的药物。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各种植物种实中，曾发现有金银花种实。金银花亦称忍冬，是多年生常绿缠绕木质藤本植物，叶对生，卵形，有柔毛，夏季开花，苞片叶状，花唇形，成对生对叶腋，初白后黄，黄白相映，故名金银花。花、茎可入药，花性寒，味甘。功能为清热解毒。

1975年，广西合浦堂排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个铜碗中装满了铁冬青的树叶与果实。出土时，这些树叶尚为草绿色，叶脉清晰，果子夹在树叶中。铁冬青又名熊胆木，也叫红熊胆，是一种常绿的乔木，夏季开花，它的茎、叶皆味苦，性寒，皮和叶都可入药，功能为清凉解毒、镇痛。据说两广地区街头摆卖的“王老吉”凉茶，就是用铁冬青的皮、叶加茅根、甘草熬成。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也随葬有一些药物。在西耳室一个铜盆内发现一个灰黄色的长约2.5厘米、重约10克的羚羊角，角上有锯齿痕。羚羊角有清热解毒之效，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在该室地面还发现了一些因埋葬年久变质了的中草药材。在主棺室里的一个精致的银盒中，内装一堆圆形颗粒状、直径约为0.3厘米的灰黑色药物，经化验，药物已炭化了。但从药的形态而言，中国药类在宋代以前主要以汤剂为主，而古代的阿拉伯药则以丸、散、膏为主。药物是古代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出口商品，因此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从阿拉伯国家输入。它装在精致的银盒里并埋在主棺室也

足以说明其属珍贵之药物。



■上图是广西贵县粮食仓库15号墓出土的西汉陶熏炉，通高1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7.2厘米。近球形，子母口，伞形盖，柱形直柄，圈足。这是一种焚烧香料的用具，于盘中置入炭火，将香料放入内慢慢燃烧，所产生的香气从盖上的孔溢出。



■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陶盒中的铁冬青。两汉时期，广西人已普遍使用一些中草药。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一个陶盒内，装有植物的叶片，经鉴定为铁冬青。铁冬青是现在南宁泡制“王老吉”凉茶的原料之一。

象牙与犀角

从海外输入的物资中，象牙和犀角也是较为重要和需求量较大的货物。

象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哺乳纲，象科，有两种。亚洲象(*Elephant maximas*)分布于印度等南亚地区，我国云南及毗邻广西的越南也有。故《说文》曰：“象，南越大兽。”非洲象(*Elephant africanus*)则产于非洲。当然能制造装饰品的象牙只是指大象两根弯曲的长牙，而不是指大象的其他牙齿。象牙一般呈弧形弯曲的角状，几一半是中空的。象牙的横截面多呈圆形、近圆形，直径随象的品种、生长期和部位而异。同一根象牙从牙尖到牙根横截面直径逐渐变大。象牙的化学组成成分是羟基磷灰石和有机质，两者的比例大致为 65:35。象牙的颜色新鲜时呈白色、奶白色、瓷白色、淡玫瑰白色，它具有美丽柔和的油脂光泽，多呈微透明至半透明。折射率为 1.54，硬度仅为 2.5 左右，比重通常为 1.85，断口呈裂片状、参差状。象牙具有极好的韧性。

象牙有非洲象牙和亚洲象牙之分。非洲象牙一般较长，其牙质相对较硬，为奶白色，主要产于非洲，如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加蓬、喀麦隆等，最优质的主要来自坦桑尼亚和喀麦隆。亚洲象牙一般较短，色白但易变黄，主要产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其中以斯里兰卡产的为最好。

象牙的质地光洁、细致，硬度适中，用象牙加工的工艺装饰品或实用器物自古以来便深得人们的喜爱和珍重。中国用象牙制作饰物和实用器物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远溯至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从考古资料看，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象牙梳子、镂空的象牙筒。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象牙工艺品。20世纪70年代在广东佛山河岩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有四千多年前的象牙环、象牙梳形首饰和一件形如喇叭、薄如蛋壳的象牙制品。

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专门的制品场所和大量的骨制品，而且发现了一些用象牙制作的杯、筒、梳子、尺子和祭祀用的礼品。在商代王武丁妻子的墓里有两件象牙酒器，从造型上看是仿青铜器的，上面镂空浮雕、兽面纹和方雷纹，还镶嵌了许多绿松石作为装饰。这说明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周朝，象牙雕刻已作为正式的手工业被记载下来。据史书记载，周朝的手工业称为“八材”——珠、象、玉、石、木、金、草、羽，其中“象”是象牙雕刻和骨制工艺的泛称。各个诸侯国向周天子进贡时，象牙也是主要贡品之一。鲁国的诗歌就有关于“贡元龟象齿”的记载。象牙本身没有观赏价值，周天子要诸侯进贡象牙，其目的也是为了制作供观赏的象牙工艺品。在春秋战

国时代，象牙雕刻的工艺技巧和制作规模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据荀子《王制篇》记载，象牙和珠宝、玉石作为商品在各国市场上出售。在韩非子《喻志篇》里记载有一个宋国人用象牙雕刻楮叶，三年刻成，放在真楮叶里分不出真假。

李斯在《谏逐客书》里提及的各地输入秦朝的贵重特产中，就以“犀象之器”泛称象牙工艺品，并和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相提并论，足见象牙工艺品的名贵。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当年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也想得到“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等地方珍品。秦汉时，象牙已是朝廷官吏喜好的珍品。海外输入的象齿不仅有源自越南或东南亚国家，也有源自非洲。据《后汉书·西域·大秦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即今罗马。1983年发掘的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曾出土大象牙5枚，成堆叠放，每枚长度均超过1.2米，最长的达1.26米，全属粗壮形，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亚洲象的纤细形牙明显有别，应为非洲象牙。由此说明，非洲的象牙在西汉早期已辗转贩运到中国。这条从南中国海至印度洋的民间航路早于汉武帝平南越之前就已存在，正是在这种民间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的基础上，汉政府才正式设立合浦港，正式派遣官方贸易使团远航海外进行贸易活动。

犀亦称犀牛，是体形粗大的哺乳类动物。吻上有一或二角，即犀角。毛稀少，皮厚而韧，多皱纹，色微黑，以植物为食。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和非洲。犀角可制器，也是珍贵药材，有凉血、解毒清热作用。《汉书·地

理志》载：“南越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亦一都会也。”这里所说的南越的珍贵商品，非尽南越所产，甚至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各地，因“处近海”，可从海道输入。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过陶犀角模型 19 件，其中 M1153 出土 4 件，胎红黄色，残，大小相若，残长 10 厘米；M1134 出土 15 件，有 6 件系青灰胎，质坚硬；其余 9 件为红黄色，略软，形制全同，底挖空成圆锥形，与角体相应，角的尖端切平，大小相若，长 17 厘米，底径 6 厘米。另外广州汉墓 M1134 出土一个漆扁壶，两面都以朱漆绘一犀牛。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犀角的珍视。

中原统治者对犀牛及犀牛角亦十分喜爱，商周时期就有取材于犀牛形态制作的青铜犀尊。1923 年在山西浑源县战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嵌红铜狩猎纹豆中，其图案所表现的正是猎人持矛狩猎的情景，猎物中有一对犀牛，画家的用意可能是要表现一雄一雌。大约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犀牛已稀少甚至灭绝了，中央王朝所需的犀牛犀角主要来源于南方或东南亚诸国。

《汉书·南越传》记载，赵佗给朝廷的贡品有“犀角十”。《汉书·平帝传》记：“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汉书·王莽传》也提及“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据考，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东海岸，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船停泊、进行商贸活动的一个国家。因此，犀角乃至犀牛都应是当时海外贸易输入的热门商品之一。